

阿·托尔斯泰和他的《彼得大帝》

朱 雯

《彼得大帝》是苏联作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一部杰出的长篇历史小说。

阿·托尔斯泰于一八八三年一月十日出生在伏尔加河畔俄罗斯草原上一个名叫尼古拉耶夫斯克（现名普加乔夫斯克）的小城。他父亲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伯爵是个地主。母亲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是十九世纪早期著名的俄国金融家、十二月党人的领导者之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屠格涅夫的侄孙女。他是遗腹子，他的童年是在索斯诺夫卡他继父阿列克谢·阿波洛诺维奇·博斯特罗姆的农庄上度过的。那里是个边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各样世俗的和教会的逃亡者的避居之薮，流传着许多记述遥远过去的英雄业绩的民间传说和古老谣曲。那时候，俄罗斯的贵族地主已日趋没落，而伏尔加河彼岸的地区则仍然保留着遥远过去的不少残余痕迹。光怪陆离的外省地主，灾荒饥饿的凄凉田园，淳厚质朴的乡村生活，让未来的作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给他提供了触发想象、引起追忆的非常丰富的素材，正象他后来在给青年作家讲话时谈到的：“我想，如果我是生长在城市，而不是生长在农村的话，有千百种的事物恐怕我从童年起就一无所知，——例如象草原上和荒村里的冬天的暴风雪、圣诞节、茅屋、占卜、神话、松明，以及散发着一种特别气味的禾仓；大概我也不可能象那样的去描绘旧莫斯科。旧莫斯科的风光就是根据我童年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回忆表现出来的。对时代的感触和时代的实体，就是从这里呈现出来的。”^①

正是他童年时代的这种生活经历，构成了阿·托尔斯泰早期创作（《伏尔加左岸》，1910，《怪人》，1911；《跛老爷》，1912）的主要题材。在这些小说里，作者不仅对人物的性格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刻划，对人物的命运作了深入的分析描绘，而且还在不同程度上对历史发展的趋向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对乡村贵族的没落作了形象的揭露。

为了从回忆的题材转向具体生活的描写，需要了解现实生活的意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一个随军记者的身份上了前线。在当时所写的战地通讯中，他一方面如实地报道了硝烟弥漫的战地生活，一方面却也不加掩饰地表示了自己对祖国前途的隐忧。俄罗斯国家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这个变革的时期，我又碰上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由于他看不到革命的历史前景，并错误地把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感情对立起来，阿·托尔斯泰于一九一八年离开祖国，前往巴黎，一九二一年又移居柏林，在国外度过了四年多的流亡生活。关于这几年的情况，他后来在《我的小传》中写道：“侨居国外的这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最艰难的时期。在那里，我才明白做一个受人鄙视的人，做一个脱离祖国、无足轻重、无所作为、在任何情况下不为人所需要的人，是种什么样的滋味了。”在侨居国外的时候，他着手创作了科学幻想小说《阿埃莉塔》（1922—1923），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尼基塔的童年》（1919—1920），长

^①《致青年作家》，阿·托尔斯泰：《论文学》，程代熙译，第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篇小说《苦难的历程》的第一部《两姊妹》(1922)以及一些揭露流亡者生活的短篇小说(《不幸的星期五》、《在床底下找到的手稿》等)。在柏林，他曾一度参加流亡知识分子组成的“路标转换派”的一个集团“前夜”。一九二二年春跟高尔基的会晤以及他们之间建立的友谊，使他对“路标转换派”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派别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对祖国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渐树立了正确的态度，他理解到：如果不为这个革命事业服务，就会失去与祖国和人民在精神上的联系，也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正是出于这种“对祖国的热爱，想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和它的建设事业的愿望”，他发表了《给恰伊科夫斯基的公开信》，信中宣称：“我们必须承认，在俄国或在俄国境外，除了布尔什维克政府，决没有任何别的政府。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我们就得竭尽全力帮助俄国十月革命这个最后阶段朝着使我们国家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更加丰富，从革命中得到一切美好和正确的东西这个方向发展。”就这样，他以这封信作为“护照”，于翌年春天闯到了苏维埃俄罗斯，而作家的创作生活，从此也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月革命给阿·托尔斯泰的创作打开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使他的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特别是二十年代后半期，苏联在革命和建设方面的光辉成就更对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一面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一面努力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认真吸取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经验，深入思考如何表现革命主题、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从那时候起，他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长篇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第二部《一九一八年》(1925—1927)、第三部《阴暗的早晨》(1940—1941)相继问世。第一部《两姊妹》又作了重大的修改。这个三部曲是以十月革命前夕、革命时期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以达莎、卡嘉两姊妹和他们的爱人捷列金、罗欣为代表的的知识分子经历曲折复杂的道路最后走向革命的过程，表明知识分子只有与人民相结合才是自己的出路，只有献身祖国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中篇小说《粮食》(一译《保卫察里津》，1937)描写国内战争时期苏联人民保卫察里津的英勇战斗，作家把它看作是《一九一八年》至《阴暗的早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长篇小说《彼得大帝》也是在这个时期写作的。

在卫国战争时期，阿·托尔斯泰写了许多政论和别的文章，向全国发出爱国主义的号召：为保卫祖国、保卫自由与社会主义祖国的独立，向法西斯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其中反响最大的有《我们在保卫什么？》、《祖国》、《人民的血》等。他一面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进行写作，一面继续发掘历史题材，完成了“戏剧故事”《伊凡雷帝》(包括《雌雄鹰》，1942；《艰难的年代》，1943)，同时还发表了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伊万·苏达廖夫的故事》(1942—1944)。

阿·托尔斯泰正在为保卫祖国而战斗的时候，不幸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了。他勤奋地写作了一生，留给我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和政论等各种体裁的大量作品，其中有一部小说没有来得及完成，那就是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

二

关于彼得大帝的题材，阿·托尔斯泰从二月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开始注意了。他后来告诉读者：“也许，这与其说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活动，还不如说是出于一个艺术家的本能。我在这个题材里找到了关于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的谜底。”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他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彼得的日子》，在这里作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彼得大帝活动的宏

大规模以及进行改革的坚强毅力，但是彼得这个形象却被塑造成专制、残酷、孤独的悲剧性人物，完全抹杀了他在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方面所起的历史积极作用，以及俄罗斯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时候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崇高牺牲。这是因为阿·托尔斯泰在写作这篇小说的当时还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用他后来对另一个以彼得大帝为题材的剧本《在刑台上》的自我分析的话来说，就是“对于时代的描写，我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传统’的窠臼”，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深刻理解那个复杂时代的矛盾，没有真正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虽然彼得坎肩上的一切污痕我都看到了，——但是他仍然象一个谜似地屹立在历史的浓雾中”。直到后来作家认识到“写作《彼得大帝》，这首先是通过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理解的现实去认识历史。这就意味着，首先得改造自己的艺术家的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分析光芒的照射下，历史复苏过来了，显示出全部丰富多彩的面貌和阶级斗争的全部辩证规律”。从这里，作家得出结论说：“艺术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得到了‘活水’。”正是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阿·托尔斯泰才写出了这样一部彪炳俄国文学史册的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

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主要描写了彼得为争取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描写了宫廷贵族之间的倾轧，描写了彼得为促进国家西欧化而采取的最初一些措施。第二卷出版于一九三四年，描写了彼得为夺取水域而进行的斗争，描写了西欧各国之间的冲突，描写了彼得为准备北方战争而从事的外交和军事活动。按照作家的创作构思，这一、二两卷仅仅是第三卷的一支序曲，而第三卷才是长篇小说最主要的部分。它将描写彼得大帝的立法工作和改革活动，描写俄国军队保卫尤里耶夫和纳尔瓦城的英勇斗争，还将描绘国际上的叱咤风云和西方一些国家——法国、波兰和荷兰的绚丽多姿的图景。作家原来打算以波尔塔瓦战役或普鲁特远征作为全书的结束，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封信里写道，“这部长篇小说，我只想把它写到波尔塔瓦为止，但也可能写到普鲁特远征，这我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不愿意让书中的人老起来——我把他们这些老人怎么办呢？”但是一九四五年作家的逝世，使这个计划没有能完成，小说只写到一七〇四年收复纳尔瓦城为止。这自然是个无法弥补的损失。然而从小说的主题来看，照目前这个样子，也仍不失为一部完整的作品，因为体现在彼得这个人物形象身上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特征已经充分显示出来，而旨在“表现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威力，表现人民的不可抑止的创造精神”的创作意图也已经完全达到了。

阿·托尔斯泰是以一个艺术家兼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动笔以前，他对彼得时代的有关历史文献进行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研究。他广泛研读了本国和外国的同时代人的回忆记录，翻阅了沙皇律令诏书和彼得本人的信简文札，并查看了当时的历史档案材料乃至刑讯犯人的口供笔录。这一切不仅有助于作家掌握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俄罗斯人民的性格特征，而且也有助于了解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和人们的心理状态。为了追求艺术上的高度精确，阿·托尔斯泰还十分重视反映彼得时代的旧版画、雕塑以及当时的日用器皿等文物。在写《彼得大帝》的最后一卷之前，作家曾多方搜求叶卡捷琳娜的画像，结果终于让他找到了。于是他把这幅油画像和卡拉瓦克所作的彼得大帝像一起悬挂在书室里，朝夕相处，成为他引起遐想、孕育灵感的催化剂。

当有人问到他写作《彼得大帝》利用了哪些历史文献时，阿·托尔斯泰曾直率地回答道，“就拿念过的这一章^①来说，它就完全是文献性的。乌克兰采夫的那几封信，就是真正的文

^①指《彼得大帝》第二卷第一章的第十一、十二两节。

献。在这里，从苏丹的妻妾起一直到向莫斯科的海军中将兜售咖啡这样的事情为止，这一切都是历史地真实的。”^① 其实何止是这几封信而已，便是一七〇〇年十二月五日，即纳尔瓦战败以后两星期，彼得给鲍里斯·彼得罗维奇·舍列梅季耶夫的信也录自业已成为国家档案材料的原件。其他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是作家对这些文献性材料都运用得那么娴熟自如，浑然一体，已经成为整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三

历史小说的一项重大任务，在阿·托尔斯泰看来，是塑造人物——塑造时代的人物，并通过人物来反映一个历史时代。在《彼得大帝》这部历史小说里，中心就是彼得大帝这个人物，通过这个人物，展现了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宏伟壮阔的生活图景和历史事件。小说从彼得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写起，依次写到沙皇费多尔的晏驾，彼得的继位，索菲娅的摄政，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进军，射击军的叛乱，索菲娅的垮台，远征亚速的胜利，彼得随大使团出国，改革活动的开始，圣彼得堡的兴建，一直到对付瑞典的战争和收复纳尔瓦城的胜利。从古老阴森的皇宫到荒僻简陋的农舍，从庄严肃穆的修道院到清新整洁的外侨区，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艨艟汇集的海域，从风光绮丽的荷兰港口到制表造船的英国工厂，都是情节展开的场所。从宫廷朝臣到市廛商贾，从东正教主教到分裂派信徒，从逃亡的农奴到落草的匪盗，从外国王侯到异邦工匠，都是故事涉及的人物。在这幅五彩缤纷的历史画卷中，为众星所环拱的“北辰”便是彼得大帝。对彼得这个人物形象，作家进行了精心的刻画，创造了一个历史人物的典型，用阿·托尔斯泰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既“没有想到要把那个陈旧的、文选课本上的‘木匠皇帝’的形象复活过来”，也“不愿……贬抑那处在时代顶峰上的个人的意义”，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表现了处在重要历史转折点的一个伟大改革者的历史功绩，揭示了体现在彼得身上的俄罗斯人的坚强性格和创造精神。

在阿·托尔斯泰的笔下，彼得大帝首先是一个改革者，一个改变国家落后面貌、使俄罗斯跻身于西方先进国家之林的伟大改革者。在小说里，彼得不止一次地痛斥俄罗斯的落后。有一次在国外，看到了汉诺威附近科本布吕格小镇上清静整洁的市容，他对缅希科夫说：“这种生活才可爱呢……真是个乐园。……一想起莫斯科，我就恨不得把它烧一个光！……”在莫斯科，“人们总是墨守陈规，直到屁股发烂。……一千年了，他们还没学会种地……”后来他在勃兰登堡选帝侯夫人家里作客的时候，更加激动、更加坦率地告诉她们：“我们的领主和贵族都是笨头笨脑的庄稼人，只是睡觉，塞饱肚子，做做祈祷。……我们的国家死气沉沉。你们在那儿，恐怕连一天也不敢住。……光是莫斯科一地，就有三千土匪……”即便是他所倚重的商人，彼得也认为“十足道地是野蛮人，——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不知跟他们斗过多少回了！在他们看来，主要的事就是要出卖霉烂的货物，——连三年，他们会撒谎，会起誓，会哭泣，会偷偷地塞出去霉烂的东西，直到新鲜的也都霉烂了才罢。……”当时缅希科夫就指出：“的确是这样，明·赫尔茨，愚昧无知嘛。”愚昧，落后，野蛮，这就是彼得所面临的俄罗斯。“要消除我们的蒙昧和愚蠢，”也就成了彼得唯一的“一件心事”，用他对选帝侯夫人索菲娅母女所说的话来表达，就是“在俄罗斯，样样东西都应当被粉碎，样样东西都得重新改造过”。

^① 《与〈青年一代〉编辑部谈话的速记稿》，发表在苏联《青年一代》杂志1933年5月第九期上，译文见阿·托尔斯泰；文学·程代熙译，第232页。

因此，彼得大帝所进行的改革，归根结底就是要“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仿效西方主义”（列宁语），走上西欧化的道路，以克服和改变它千百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的落后状态。在长篇小说里，阿·托尔斯泰正是从这一理解出发，着重描写了彼得如何学习西欧，在发展俄国政治、文化等方面所从事的活动以及所作出的贡献。一六九八年八月，彼得从维也纳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在皇宫里把所有前来朝觐的领主、公爵、将军们的大胡子统统给剪掉了。这个改变俄国人外貌的措施，乍看起来象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因为留须的习惯是由正教教会造成的，所以强迫剪掉大胡子也就成为革除旧习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活动。一六九九年二月，彼得又下了一道诏书，规定“领主、朝臣、官吏、录事与商人，自今以后一律须穿匈牙利衣服，概无例外，春天来临，寒意减退以后，应穿撒克森长襟衣”。这一措施又从衣着上改变了俄罗斯人世代相传的古老习惯。同年十二月，彼得又进行了一项新的改革，“计算年代不以创世之时，而以基督降生八日以后开始，因此新年不始于九月一日，而始于一七〇〇年一月一日。”这一敕令，连同所规定的举国上下必须参加新年庆祝活动的各项具体办法，标志着在年代的计算上俄国也开始采用了欧洲许多国家通行的历法。当然，作为一位“真正的伟人”（恩格斯语），彼得大帝最重大的改革乃是使落后的俄国完成了工业上的跃进。

十七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这个依旧处于农奴制秩序统治下的国家，虽然在经济方面已经出现了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六十年代在莫斯科郊区已建立了一家造船厂，也造了几艘海船，但是即使仅仅用以保护来往于黑海的俄国商人的贸易利益，这样的数量和质量在当时也已显得很不够，更何况这已经是九十年代，而彼得也完全相信“没有黑海和亚速海，你没法儿过日子……你没有波罗的海也不成……”。他需要出海口，而这就需要有海船，需要有海军，需要有战舰。阿·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里描写了彼得在沃罗涅什造船厂亲自指挥造船，又描写了彼得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参观学习，“到造船厂干一冬天木匠活”，随后又去英国伦敦郊外一家造船厂，“花了两个半月工夫，学习了数学和船舶设计制图。为了在莫斯科创办一所航海学校，他聘请了一位学问渊博的数学教授安德鲁·弗格森，另外他还邀约了一位水闸专家约翰·佩列上尉去指导开凿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于是一大批外国的指挥官、领航员、水手长、医生、水手、船上的厨工、造船的和炮术的专家们，绕道阿尔汉格尔斯克和诺夫戈罗德到达莫斯科。不久，从俄国自己的造船厂里，不仅造出了一艘艘商船，而且还建成了一支舰队：“一溜九十八艘有两层甲板的大海船，前面后面还有二十条平底帆船和二十条两桅帆船，还有侦察船、快艇和帆桨大船：八十六艘战船和五百条驳船”，在浑浊的、涨水的顿河里往下驶，远远地伸展在弯弯曲曲的河面上。就靠这支阵容堂堂的海军舰队，彼得取得了远征亚速的胜利；经过不断的补充和发展，在正规陆军的密切配合下，后来又取得了战胜瑞典军队、收复纳尔瓦的伟大胜利。

造船事业只是彼得发展工业的一端，从长篇小说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俄国商人在雅乌扎河和莫斯科河开办呢绒、麻布和丝绸织厂，造纸作坊和搓绳厂。有些呢绒和麻布织造厂用水轮带动织机；有名的锻铁工匠库兹马·热莫夫在索科利尼基的锯木厂里还安装了一架靠蒸汽锅炉发动的奇妙的发动机。所有这些都加速了“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仿效西方主义”的进程，首先在经济上有效地改变了俄国长期来停滞不前、愚昧落后的面貌。当然，发展工业，振兴商业，无非是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而其最终目的，也无非在于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彼得的改革正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符合于民族的利益，因而在俄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阿·托

尔斯泰对彼得和彼得时代的这种正确理解，用生动的形象在长篇小说里充分体现了。

四

列宁在论及彼得大帝时指出，他“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仿效西方主义”，曾“不惜采用独裁方式，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①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②在长篇小说里，阿·托尔斯泰正是在肯定彼得的历史功绩，描写他作为一个伟大改革者的才艺出众、热情奔放、坚毅果断等特点的同时，也表现他作为一个专制君王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残酷无情的个性，从而揭示出阶级和时代的矛盾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彼得在反对野蛮势力，具体地说在反对社会上的因循守旧势力和宫廷内部的宗族敌对势力时，所使用的手段是野蛮的，有时甚至是极端残忍的。作为改革的开始，在西欧化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彼得强迫领主、贵族们剪胡子、戴假发、吸烟草，喝咖啡、穿外国服装，并要妇女们社交、跳舞等等，那个做法可就十分粗暴，因此弄得人心惶惶，许多领主便巴不得彼得出国远行。他们觉得哪怕只有这么片刻的宁静，心里也很高兴，“沙皇眼下不在莫斯科，就不会再强迫他抽烟，剃胡子，或是要他穿那种裹到膝盖的白长袜，戴那种直垂到肚脐的、用女人头发制成的假发，旋转蹦跳了”。一六九八年九、十月间，彼得处决那批参加叛乱的射击军，其手段之野蛮，方式之专断，更是旷古未有，骇人听闻。阿·托尔斯泰在小说中用摘引皇家大使馆一位秘书的日记的形式，描叙了从严刑审讯到执行死刑彼得都亲自参加的详情细节，其中如：

断头台早已准备好了。刮起一阵寒风，每个人的脚都给冻坏了，他们却还不能不等候很长一个时间。……后来，沙皇带着他的宠臣亚历山大赶到了，跳下马车，就在一座断头台的附近站着。在这段时间里，一大群死囚走上来，把个倒楣的广场都给挤满了。

新圣母修道院前面立着三十个绞刑架，排成一个四方形，有二百三十名射击军就在那上面被绞死了。向索菲娅长公主呈递请愿书的三个主犯给绞死在修道院墙上，正对着索菲娅的修道室的窗口。吊在中间的那个人，死僵僵的手上还系着那份请愿书。

……十月二十七日……今天的执行死刑跟以往几次都很不一样。执行的时候，用了种种不同的方式，而且几乎都是难以置信的。……三百三十个人同时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红场。这种大规模执行死刑之所以能够做到，只是因为所有的领主、杜马议员、秘书官都奉旨担任了刽子手的工作。……这些出身高贵的缙绅统统赶到了广场，一看那面临着他们的考验，早已在瑟瑟打抖了。他们每个人面前放着一个死囚。每个人必须向自己面前的罪犯宣读罪状，随后执行死刑，亲手砍下他的脑袋。

彼得的这种野蛮与残酷，其实是贯穿在他整个的改革过程之中的。这种改革虽然使俄国社会前进了一步，然而它是在残酷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奴的基础上实现的，长篇小说并没有掩饰彼得的改革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只觉得“在索菲娅当权的年代，多少还有个节制，而现在，那些强悍的、有势力的人却把普通老百姓的灵魂都给抖出来了。法庭上没有公道，到处是贪污受贿，盗窃国家财产。很多人逃到森林里去当强盗。还有人走到北方

^①《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4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河边那些原始丛莽中去，离开这种倒楣的生活，避过那一大群残酷而非法地吮吸他们鲜血的总督、地主、秘书和书记、地方官和乡镇长的压迫。在北方，他们可以过洋洋噩噩的生活，河流和森林会养活他们。”

就拿确曾使俄国摆脱野蛮落后状态的发展工业、兴建工厂来说吧，这一改革措施加给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也是不可想象的。阿·托尔斯泰用简洁明净的语言，进行了愤怒的控诉：

在那些拨给工厂的村子里，很多人都从新的奴役下逃出来，到了荒僻的边区。在村子里服劳役是够苦的，有些牲口过得还比农民轻松些。可是在这些工厂中过的奴隶生活看来更加使人绝望——对犯人也好，对雇工也好，都比牢狱还糟。四面围着高高的板墙，大门口守着比狗还凶悍的警卫。在黑魆魆的车间里，朝隆隆作响的机器伛着身子，人连歌也不能唱，——外国工头会用手杖抽他的肩膀，会用地牢威胁他。在村子里，每逢冬天，农民至少还可以在暖炕上睡一个够。可是在这儿，不论冬天，不论夏天，不论白昼，不论黑夜，他不能不一直射着手里的梭子。他的工钱，他的衣服，早已预先花用在喝酒上头了。这是奴役啊。

他们把他装上一辆大车，要是反抗，就把枷锁加在他身上，送到一千俄里以外，送到伏尔加河对岸，送到野草丛生的基尔吉斯草原后面，送到林木茂盛的高山那一边——到了涅维扬斯克工厂，到了矿场上。

从那里回来的人是不大有的。那些人都被锁住在铁砧上，锁住在铸造熔炉上。倔强的还用藤条来抽。

逃是逃不了的，——哥萨克人骑着马，带着绳索，守在所有的大道和林间的小道上。至于那些企图暴动的人，都被投进很深的矿井，或是被淹死在池塘里。

阿·托尔斯泰对彼得大帝形象的刻划，总的来说也完全符合斯大林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剥削农奴来进行的。”^①

五

彼得大帝作为一个改革者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如才艺出众，热情奔放，坚毅果断，阿·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里也作了酣畅的描绘。在作家的笔下，彼得始终是一个精力旺盛、体格壮健、思想敏锐的人，他对自己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总是身体力行，亲自参与体察。他隐姓埋名，跟伟大使团一起去荷兰、英国学习造船技术，也亲自操刀弄斧，象一个普通工人那样勤奋干活，曾使外国人大为惊奇。小说作者摘引一个名叫雅科夫·诺门的荷兰人的日记，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彼得在国外的生活断片：

这时候，有一个木匠，身长差不多有七英尺，衣服上沾着焦油，卷发潮滋滋地黏在额头上，把斧子一搁，驯顺顺地奔过去，用肩膀扛起木头，帮助别人搬运，那个商人看了大吃一惊……

工作完毕以后，他就走进码头附近一家破烂的小饭馆去，要了一杯啤酒，坐在那里，抽着烟斗，跟最粗野的工人高高兴兴地聊天，听了他们的笑话而大声欢笑，在这种情况下

^①《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93—9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毫不在乎人家对他一点不尊敬。他常常去访问那些眼下在莫斯科干活的工人们的妻子，跟她们一起喝杜松子酒，拍拍她们，说说笑话……

回国以后，在建造“要塞号”战舰的过程中，彼得除了亲自指挥，还亲自参加最后一个部件的焊接工作。阿·托尔斯泰描写他在锻铁场里“穿着一件肮脏的衬衫，系着一条帆布围裙，瘦削的脸上沾着油烟的乌斑，嘴象鸡屁眼似地紧闭着，正在用长铁钳小心翼翼地翻动熔炉里的锚爪。这是一项责任重大、手艺高强的工作——焊接这样一个大件……”

在跟瑞典军队作战的时候，彼得大帝又常常亲临前线，“每天总要骑着马，到一处防工事去巡视”。有时他还象一个普通的士兵那样参加战斗，他会“把斗篷和长襟衣一脱，卷起袖管，从一个炮手那里拿过来一个炮刷，用劲地擦着给煤烟熏黑的炮筒……‘装火药！’”在纳尔瓦战役最紧张的时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没离开过炮垒。他给火药弄得乌黑，也不盥洗，凑巧有什么东西就急匆匆吃一点什么，他还亲自把伏特加分给炮手们。在大炮的隆隆声中，他往附近一躺，打这么一小时的盹”。通过这些具体而细致的描写，彼得的一些性格特点便都生动地显示出来了。

然而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伟人”的主要因素，还在于他具有远见卓识，在于他能够忍辱负重，败而不馁，并“善于把失败变成胜利的武器”（马克思语）。

为了要打通南方的海口，彼得大帝曾于一六九五年七月发动对亚速城的远征，可是出师不利，第一次和第二次突击都没有成功。“彼得给这次失败震惊了。他闷闷不乐、默默无言地走来走去，好象这几天里长大成人了。他老是转着一个念头：非把亚速攻下来不可！光荣也好，耻辱也好，——哪怕整个俄罗斯不能不弄得民穷财尽，亚速也得攻下来。”坚强的决心，化为果敢的行动。他一面召来了全国的工匠和手艺人，在沃罗涅什加紧建造船舰，一面在亚速城下构筑攻城坑道，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积极准备，到翌年五月，彼得终于战胜了土耳其军队，占领了亚速。

在纳尔瓦的会战中，彼得的远见卓识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要征服波罗的海，俄罗斯军队于一七〇〇年九月向纳尔瓦发动进攻，遇到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精锐部队的顽强抵抗。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彼得发现虽然“为这件事我们已经准备了两年……可是一样东西也没准备好……比在亚速的时候还要糟。比在瓦西里·戈利岑的军队里还要坏……”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与查理的部队交锋？于是他当机立断，把指挥权交给冯·克鲁伊公爵，自己离开了纳尔瓦。他知道这是一种奇耻大辱，人家总以为“我被查理吓倒了……我把军队丢弃了……我象好久以前奔往圣三一修道院一样，逃到诺夫戈罗德去了……”。但是为了拯救俄罗斯国家，这个耻辱以及估计以后还会发生的许多事情，他都忍受下来了。他承认“我们还没有学会战争。我们从头就做错了。……如果我们要在这儿发射一门大炮，那我就得在莫斯科把炮弹装上”。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从后方着手，从辎重车队着手”。从这次纳尔瓦的惨败中，彼得着实吸取了不少教训：“纳尔瓦的丢丑对我们好处很大。经过打击，铁会变得更加坚实，人会变得更强壮。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不少甚至是不曾预想到的。”他相信“一个吃过败仗的人，抵得上两个没吃过败仗的”。尽管“他们还会打败我们十次，到后来我们总是会胜利的”。历史证明，在一七〇四年的一次战斗中，俄罗斯军队果然把号称无敌于天下的查理十二世打败，把纳尔瓦收复了。

关于一七〇〇年的纳尔瓦会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恩格斯说：“纳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所遭到的第一次严重的失败，（下转第48页）

贺的诗“其七言难者，读之十不得四五；易者，十不得七八”。鲁迅在《门外文谈》中也慨叹“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他的诗晦涩难懂”。都是不满意他的这种过份奇诡的文风。明人王世贞在他的《艺苑卮言》中称李贺的诗“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这也是言之有理的。如果人们写诗都学李贺的诡怪一端，如果这种“长吉体”风行天下，那么，若干年以后，我们民族的语言文字必将乱套，我们将再也看不到一本可以看懂的诗集了。

（上接第8页）这个民族的果敢精神使它甚至在失败中学习如何取得胜利。”①

阿·托尔斯泰正是把这种体现在彼得身上的果敢、坚强的民族精神在长篇小说里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当他描写到一七〇四年彼得再次前往纳尔瓦城下的时候，通过回顾让他说了这样的话：“我们的军队就是在这里毁灭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查理国王找到了极大的光荣，而我们，却找到了力量。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学到了该从哪一头着手，而且永远埋葬了那一切僵化了的老古董，正是这种老古董差一点把我们彻底弄垮了。……”接着，作家还用诗一般的语言，无限深情地谱写了一曲他对彼得大帝的赞歌：

毁灭之前那不眠的一夜，他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时候，他就坐在这所小房子里，瞅住那支淌着蜡泪的蜡烛；阿列克萨希卡躺在一条毡毯上，悄没声儿地哭着。那时候，好不容易才克制了心头的绝望，羞耻，无能为力的愤怒而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到明天，查理就会不可避免地把他打垮。……好不容易使他作出了那么不可置信、不能忍受的决定，一一就在这个时刻离开他的军队，跳进雪橇，飞也似地赶到诺夫戈罗德去，让一切都从头做起。……把钱、面包、铁弄到手。……抓住一切机会，将所有的东西，哪怕是贴身衣服，统统卖给外国商人，以便买进武器，铸造大炮、炮弹。……而最最重要的是人，人，人！把人们从年深月久的沼泽里拖出来，扳开他们的眼睛，擦擦他们的肋下……打他们，扭他们，教他们，使他们成材。千里迢迢的穿行雪地，跋涉泥泞……摧毁，兴建……在欧洲的政局中跳过上千次的灾祸。回顾之下，他着实有点毛骨悚然，“嘿，那是什么样的大山还没有给搬掉啊！……”

是的，彼得大帝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伟人”，然而他的一生却是在不断对外扩张的战争中度过的。“俄国需要的是水域。”彼得大帝“他第一次对土耳其作战的目的是为了征服亚速海，他对瑞典作战是为了征服波罗的海；他第二次对土耳其政府作战是为了征服黑海”。②这是彼得一生行事的出发点，所以恩格斯称他为“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③。而对于这一点，阿·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里似乎缺乏必要的揭示和批判。

①《克里木战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60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637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